

21-12

屏山文史資料

第七輯（總第十一輯）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屏山縣委員會

88

29

屏山文史资料

第 7 辑

(总第 11 辑)

4H209/3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屏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8年9月

屏山县政协第二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委员：齐文字

副主任委员：刘时行 张怀清 凌之璞

牛本乾 陈善斌

委员：郭其弟 邓守馨 王晓君

冉良弼 朱培东 陈济鸿

张易然 郑世钦 洪铁光

徐永孚 黄佩绅 梁顺铭

杨含金 景文澄

责任编辑、校对：陈善斌

编 輯：牛本乾 张怀清

屏山文史資料

第 7 辑

(总第 11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屏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七

屏山县印刷厂印刷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资料

目 录

- 减租、退押是土地改革的前奏 胡富强 (1)
记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经过 齐国材 (6)
- 记方驰辛同志在屏山两三事 史公度 (13)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 王绍坤口述 王绍真整理 (15)
- 屏山解放时的回忆 刘大杰遗稿 (23)
陈超股匪覆灭记 张宗和 (26)
记我在解放屏山初期打入匪区工作情况 黄子忠 (32)
- 屏山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和四川
屏山中学史略 宋开鑫 (34)
蛮溪口小学初建经过 余启彬 (39)
集资培修乘彝小学的经过 巫锡乾 (40)
- 垦殖社杂记 姚蜀藩 (43)
抗建垦社 冉永松 冉良弼 (53)
中国抗建垦殖社的建立、发展、
灭亡过程概述 齐国材 (64)

我所直接了解的中国抗建垦殖社	吕甫章	(70)	
关于屏边乡中国抗建垦社	易福文	遗稿(75)	
中国抗建垦社	陈宗惠口述	黄国南整理(77)	
缅怀先烈邓树北	邓宇森	(79)	
许用康先生略传	陈仲贞	(82)	
草履楼是怎样投靠刘文辉 的	蒋 华口述	牟本乾执笔(84)	
胡国光意外起家	蒋 华口述	牟本乾执笔(85)	
民国时期屏山地方民团简介	张怀清	(86)	
陈八师过屏山	黄佩绅	(88)	
赌“马古”烧毁龙桥	王思圣	(89)	
锦屏杂志(三)	陈善斌	(90)	
新市镇话旧	李炳燊	(96)	
龙溪乡名 三次更改	刘仲伦	(98)	
记黄贵湖事迹和万福乡牌坊 工艺	黄宏发	黄盛康	黄玉林(99)

{采风錄——詩歌之頁}

1987年重九抒怀(七律五首)	刘伯元	(105)
首届教师节纪感(七律三首)	张泽霖	(107)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乐章※

第一乐章 减租退押是土地改革的前奏

胡富强

1950年冬，残匪已基本肃清。为了进一步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克服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土匪骚乱所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帮助农民摆脱饥寒交迫的困境，发展农业生产，完成征粮、征税、清匪反霸任务，稳定革命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减租、退押运动。

减租，是减少农民向地主租佃土地所交纳的地租；退押，是将地主出租土地时向农民索取的抵押金退给农民。这两者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用其占有的土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农民进行残酷压榨和剥削的手段。农民要生存，只得向地主租地耕种。租地，不仅要向地主交纳地租，还要交纳相当一笔可观的“顶首”——即押金。而且要落实监证人、签立租约、大办把待后，才能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经营权。

地主通过地租向农民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有三：一是根据土地面积（屏山解放前的土地面积单位是依“石、斗、升”计算，“每‘石’约等于一亩田）多少交纳押金和定死租额。例如，一石田交五斗或一石谷子地租。以后不管收成好坏，

每年秋收后均如数按租约收取。如抗交或交不清地租，地主可依靠反动统治势力强迫交租，甚至收回出租的土地。农民把这种剥削方式称之为“铁板租”。

二是根据土地面积，定重租，不定押，若遇严重自然灾害减产，农民可向地主要求减租。个别地主有时也口头应准少交一些。农民把这种调减称之为“口头让地租”。

三是根据土地面积，按每年实际收益的一定比例交租。有的除交押金外，以年收益50%交纳；有的不定押金，年终收益实行倒四六分成，即农民得40%，其餘60%交给地主。

在这样一种租佃制度下，当农民获得土地经营权时，往往已腰无半文，无力购置必要的种子、农具、口粮等生产、生活资料。地主则乘此机会，又用榨取得来的押金、租金作为本钱贷给农民，收取高利，从而对农民又增加了一重经济剥削。这就迫使相当一部分农民一年辛苦到头，连最低生活也难维持，甚至倾家荡产，走投无路。而地主则肥上添膘，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正如那时有首《谁养活谁》的歌词中所唱：“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工厂是工人修的，粮食是农民种的……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因此，打倒封建地主阶级，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最根本要求。但当时解放不久，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故首先实行减租、退押，先让农民喘一口气，把生产搞上去。

减租退押，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斗争的实质，是租地经营的农民要从封建地主手中获得“二五减租”（即减少地租总数的25%）和收回全部押金。这对于地主阶级是一次严厉的打击。因此，斗争是十分尖锐激烈的。

为了搞好减租退押，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租地经营的农民群众。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依靠雇、贫农，巩固地联系中农的阶级路线，加强和巩固与雇、贫农群众的联系。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农民群众，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组织他们有领导地投入减租退押的斗争。同时，依靠雇、贫农中的骨干积极分子，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农村政治、经济情况，通过他们去串联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逐步形成以雇、贫农为主体的一支重要阶级力量。为此，在1950年冬初，全县分区集中培训农民骨干积极分子1580人，其中雇贫农1196人，占培训总数的75.69%，中农299人，占18.92%。其他85人，占5.39%。在培训骨干的基础上，依靠他们建立和健全乡、村农民协会，为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开展减租退押斗争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全县参加农民协会的会员达10410人，其中雇贫农7186人，占入会总数的69.03%，中农2528人，占24.29%，其他525人，占7.68%。并依靠乡、村农民协会，领导农民群众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减租退押的斗争。

为保证这一工作的正常开展，在乡、村农民协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和健全相应的乡、村联防自卫队，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保卫减租退押的顺利进行。全县参加乡、村联防自卫队的队员达5421人，其中雇贫农3674人，占队员总数的67.77%，中农1432人，占26.55%，其他213人，占5.68%。自卫队在减租退押中起了保卫工作的重要作用。

在建立和健全组织的同时，有领导、有部署、有纪律、有目的地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展减租退押的农民

群众运动。一是召开村民大会、农民协会和各种条条会议，反复深入地给干部和群众讲清：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工厂是工人盖的，粮食是农民种的，封建地主不劳而获，却占领着世界，利用他们占有的土地剥削农民，使农民处于饥寒交迫困境之中的道理；讲清党的减租退押的方针政策和帮助农民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道理；讲清搞好减租退押的关键，要靠广大农民群众联合起来，以主人翁的姿态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和合法斗争。从而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开展减租退押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怎样开展斗争。

二是召集地主开座谈会，给他们讲清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减租退押的方针政策，令其知道向农民取押收租是剥削农民血汗的行为，应自觉主动减退，并向农民赔礼道歉，决不准有任何抗拒行为。对守法的开明地主，主动减租退押，任务完成得好的，在适当的会议上进行表扬，以消除地主积恨，促进内部分化，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对极少数顽固而不减租、不退押，甚至搞阴谋诡计破坏减租退押的不法地主和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不法分子，则依靠农民协会有领导地进行斗争，从而推动这一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全县在减租退押中，经上级党委批准，对抗拒减、退的共批斗112人，其中恶霸地主47人，占比斗总数的41.96%，中小地主7人，占6.27%，旧乡、保长11人，占9.82%，匪特分子38人，占33.92%，坏分子9人，占8.03%。通过批斗，对罪大恶极，不处决不能平民愤的不法分子，依法处决6人，占比斗总数的5.35%，判刑10人，占8.92%。参加批斗会（以乡为单位批斗5次，保批斗325

次）的干部和群众共达48 343人。其中批斗发言的3 059人，占参会总人数的6.4%。

在减租退押中，由于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正确运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有力地促进了地主内部分化，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因而保证减租退押的正常健康发展，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全县截至1951年1月10日为止，计减租5 356 694斤，退押1 937 472斤。

通过这场斗争，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减租退押，战胜了困难，不仅使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增加了对土地的投资，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使1951年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地恢复和发展，而且大大地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巩固了乡、村民主政权，促进了征粮征税任务的完成，并为农村土地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8年3月3日

预告：作者的另外两篇文章：《回忆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六一五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诞生》将在下辑刊出。

——编者



（上接第14页）

他对人们的常用警语：“谁要在言行上脱离劳动人民，那他实际上就开始背离革命，就会辛辛苦苦地一无所获！”

1987年11月18日

记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过

齐 国 材

1950年1月18日，屏山解放了。在党的关怀领导下，我参加在屏山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工作。1954年1月，转入县工商联工作，一直到1976年底退休。现将过渡时期党对屏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忆述于下。

一、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解放后的1951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已经完成，抗美援朝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胜利，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对地发展，私营企业利润增加，以我县城关镇整个工商业1951年底统计资料为例，流动资金达45 761元，比解放初增长两倍；固定资金由解放初的20 000元不到增长到40 429元。由于资本家从旧社会而来——所谓“无商不奸”——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从其唯利是图的本质出发，见利忘义，施放糖衣炮弹，腐蚀国家干部，大肆进行违法犯法活动。仅城关镇317户座商中，直接、间接受赃户就有75户，总计受赃款为73 040元。

为了对资产阶级进行一次集中的改造运动，党中央决定开展全国性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

我当时体会到，这场斗争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集中表现。

运动发动起来以后，党中央曾指示各地，不要乱抓资本家进行审讯，不许肉刑逼供，要严防自杀。在运动后期进行处理时，中央确定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对私营工商户按五类划分，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实行区别对待，把打击面限制在极少数完全违法户。但由于运动来得似暴风骤雨，个别干部缺乏工作经验，也曾出现一些过火行为，但总的说来，运动还是正常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二、县工商联建立经过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要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仍然需要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依照《共同纲领》规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负有协助党和政府团结、教育和改造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政治任务。

工商联是统一战线范围的工作机构，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能起到桥梁、纽带作用。

1950年10月，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屏山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简称“联筹会”）。当时担任主任的是钟静山，副主任是刘济苍，秘书龙翰芳。

“联筹会”刚刚建立，全国人民掀起了为抗美援朝献金运动。屏山工商界响应党的号召，超额完成了献金任务。在土地改革过程中，联筹会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城乡联络委员会”工作，保护了工商业者兼地主成份的户在城乡的企业不被没收，正确体现了党的土改政策。

为了适应过渡时期总路线形势的需要，在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指导下，1953年9月，联筹会改组为屏山县工商业联合会。各区建立工商联区分会。其余乡、场建立工商小组。刘济苍、钟静山、齐文字分别当选为县工商联正、副主任。先后担任秘书的有袁大福、权继熙、李国荣。

县工商联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对私改造的方针、政策，引导私营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工商联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税务局评税和协助市管会管理、检查市场违法情况，并经常到区、乡辅导工商业者学习时事政策。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党的主要任务是要用逐步的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通俗的说法是“一化三改造”，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1954年初，乐山地委通知屏山县工商联负责人和秘书等赴犍为列席犍为县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听取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传达报告。明确了总路线的内容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规定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采取合作化的道路进行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逐步实现国有化。

由于我国的历史条件和苏联及东欧各国不同，因此，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步骤和做法，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并且独创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那就是对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采取政治上打倒、经济上剥夺的方针；对具有两面性的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运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思想，制定了和平改造和赎买的方针。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方针进一步明确为利用、限制、改造。这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明确化和具体化。

犍为会议后，屏山县工商业联合会紧接着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响亮地阐明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平改造进行赎买的方针、政策，号召屏山全县的私营工商者，积极行动起来，响应党的号召，接受改造，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心存疑惧，将来稳步进入社会主义，可以“过文昭关”，“象荆头一样，只要不乱动，不会流血”，这种过渡，会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不但将来

有工作做，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会议还传达了党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方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把不受限制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变成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有三：一是公私合营；二是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等；三是私营商业向国营进货按牌价出售，企业的利润分配，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进行处理。

这次会议，解除了与会者的顾虑，从而积极接受改造。

经过解放后的调整，当时屏山全县的私营工商业者尚有1000多户，多是夫妻商店或个人经营的小商小贩。他们资金少，规模小。雇有少数工人的只有几家油坊和面坊，与大中城市的工商企业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但，这一特点没有很好被认识，以致在随后的改造过程中，即1954年下季，由于国营合作社商业前进太快，对私商有所排挤，使私营商业萧条，出现亏蚀赔累。如屏山大众书店即因此宣告结束。1955年4月，中央纠正了这一偏差。

四、迎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经过解放以来五年多的工作，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资本主义阵地已经大大削弱和缩小了。据1955年底的资料，工业方面，除手工业外，已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和纳入了加工订货的轨道，私营部分，仅占15%。商业方面，全县乡、镇的国营、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销、代销企业

的营业额，已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3.6%，纯粹私营商业只占19%（其馀7.4%为农民直接另售）。

1956年春回大地，全国政治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全国。

面对这一新形势，中央改变原来制定的在今后两年内分期分批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先收编，后改组的做法。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的：“他们要求的很厉害，天天敲锣打鼓，迎接公私合营，就只好倒个头，先承认公私合营，再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

屏山县工商联于1956年3月，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2月份乐山地区工商联会议精神（乐山会议，屏山工商联共出席15人）。紧接着又在全县工商分会、小组进行传达。引导全县私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大舞龙灯、狮灯，鞭炮连天，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庆祝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经过批准和改组，全县进入社会主义商业轨道的原私营商业户1131户，从业人员1230人，供养人口2498人，雇用职工82人，固定资产62 708元，流动资金39 486元。1956年营业额为1 636 024元。比上年增长2倍多。

当年城关镇对私改造主要行业归口情况如下：

1、贸易公司：含酱园、糖果、土酒、杂货、服务、饮食、纸烟共180户。

2、日杂公司：含百货、杂货、陶器、五金等共41户。

3、粮食公司：油业、面粉、粮食、碾米共16户。

4、百货公司：百货、棉布、纸文等共40户。

5、供销社：猪肉、医药、饮食、水面、草席共16户。

其余专业对口有：土产公司有土产22户；盐业公司有盐业6户；中药材公司有中药业10户；生资站有生资3户。

一项十分艰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任务，在欢庆声中顺利完成了。然而随之而来的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即所谓“脱胎换骨”这一更为“艰巨”的任务，又提上了对私改造的日程。

1986年10月

(上接42页)

2 登载有关培修学校及其重要意义的来稿；

3 转抄报纸上抨击时弊的短文。

1948年阴历正月中旬，培修工程尚未结束，因我要去成都复学，兼小培修一事，全落在锡荣一人肩上。

二月，锡荣来信说：“壁报没有精力再办了。坎子砌好后，边上装了木栏杆，篮球架立起来了，将剩下的钱买了个篮球，并为学校新制了六张两抽的办公桌和少量体育用品，与王八爷联系后，帐册和一切单据交与凌治平保管。”

这次培修学校所募集的资金，按现在的物价算，约合人民币二三千元。到今天，我仍怀念锡荣弟这种可贵精神，可惜的是，他已于1963年病逝于绥江县粮食局了。

1986年6月1日